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实证研究

陈福中, 卢景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问题逐步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为进一步缓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因应之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验证了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业与居民的幸福感受正相关;居民幸福感可随着创业参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持平或盈利的创业项目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盈利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提升水平正相关。因此,应抓住“双创”的机遇,合理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同时提升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培训,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居民幸福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创新;创业参与

中图分类号:F014.5;F27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9)02-0073-12

Business establishment and national happines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EN Fuzhong, LU Jingx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Chinese economy enters a stage of “New Norm”, growth slows down and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re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 calling for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rovided a way to further ease the structural conflicts.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to ve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national happiness, and the nexus were

收稿日期:2018-12-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03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6YJC790006);北京市金融学会科研项目一般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优秀青年学者项目(18YQ07)

作者简介:陈福中(1983-),男,四川宜宾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further empirically explored. The study found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happiness; and the national happiness can increase with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participation. Balanced or profitable business projects can enhance national happiness, and the level of profitabili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national happiness. Therefore,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by making reasonable use of the preferable policies and measures, and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strengthening th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thus to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and enhance national happiness.

Key words: national happiness;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ial participation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为了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需要通过创业和创新来寻求新兴动能,以解决产能过剩以及后劲不足的问题,从而激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活力和动力。此外,中国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就业压力加大,存在就业质量总体偏低进而影响居民幸福感等问题^[1-2]。因此,大力提倡创业创新,不仅能够缓解就业压力,而且能够通过创新提升整体就业质量。

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步伐开始减缓,国际市场需求降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进出口贸易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结构性矛盾凸显。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除了需要通过创新和创业来刺激国内市场需求,还要研发出新的技术和产品,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国际市场需求份额。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201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培育和催生社会经济发展新动力,进一步做出具体部署;在之后的各项会议以及工作视察中,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国家要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形成。根据对创业者在劳动力市场的创业回报研究结果,创业者收入一般会高于非创业者,同时还可获得一些“非货币”性质的回报,如创业者良好的身体健康

状况以及较高的幸福感等^[4]。然而,在一些文献中也发现了创业并不能稳定地提高居民幸福感的证据。例如,创业者可能由于创业期间为了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承受了诸多压力,导致健康状况受到影响;以及由于把时间过多地花费在创业上,导致家庭不太幸福和睦,其最终的创业结果和自己的预期差距较大,极大地降低了幸福感^[5]。创业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非是单一的,影响方向以及效应大小均有差异,内在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向中高速调整,以劳动力供求结构问题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问题等为代表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政府提出了“双创”的号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日益加剧的结构性矛盾,也可能影响一般居民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深入讨论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以及潜在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推动创业并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思考。

一、文献综述

在已有研究文献中,很多学者对居民幸福感概念的界定,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做出的评价,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评价和某种感觉,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6]。Olshavsky et al. 和 Anderso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研究个人

满意度,提出期望以及绩效对个人满意度的影响,认为它们具有正相关关系^[7-8]。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从营销的角度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界定。Day和Lee认为个人生活领域中的事件和活动,通过由下而上的外溢理论对消费个人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引申出个人幸福感这一概念^[9-10]。Pancer et al.发现幸福感已经成为市场研究员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新兴领域^[11]。Sirgy将居民幸福感研究计划纳入五大类伦理体系,即主权伦理、非男性的义务伦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伦理、社会正义的伦理以及人类发展和生活的伦理^[12]。Sirgy et al.提出居民幸福感的理想定义,应该是捕捉个人在市场上的各种经验,捕获居民幸福感以反映个人和社会福利,以及具有非常高的判断性和实用性以帮助决策者识别原因,从而采取补救措施^[13]。谢凤华等认为,尽管学者采取不同的理论研究居民幸福感,但其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居民幸福感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或评价,以及对生活领域相关活动的心理体验^[14]。Xiao研究发现,居民幸福感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衡量,除此之外,还受到周围一些因素的影响,如政府、企业、大众媒体和技术等;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影响个人的收入、支出、债务和资产;企业或政府控制大众媒体对消费支出和其他经济行为构成影响;而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为个人提供了新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许多方面提升了个人生活的舒适度^[15]。

创业是一个跨学科并且较为复杂的经济活动,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领域。李时椿等认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业是通过必要的努力和时间,寻找、发现并把握商业机会,创建企业以及组织结构,筹备各种资源,将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过程^[16]。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有许多研究者进行了重点关注。赵向阳等从国家文化的宏观角度研究其对创业活动影响,认为现代主义文化与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动密切相关,但与创业活动的数量没有显著的关系^[17]。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来看,陈刚发

现严格的政府管制大大提高了创业活动的成本,政府管制对创业活动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为了提高创业活力,政府应该“简政放权”^[18]。创业活动使得市场更有竞争力,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予以鼓励和推动。Kirzner发现,即使是模仿创业活动也能促进经济增长^[19]。此外,Audretsch et al.认为政府决策者应当鼓励和提倡创业活动^[20]。而从经济层面而言,张龙耀等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分析后认为,金融约束对家庭创业活动有着抑制作用,但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会趋于减弱,因此要不断促进金融改革以带动创业活动^[21]。从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层面,尹志超等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对创业活动有着积极的影响,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越能推动家庭参与创业活动^[22]。

回顾已有文献,多数学者比较赞同创业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魏江等以145名创业者二代为调查对象,探索了创业动机、创业环境与创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创业机会导向动机与创业者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而得到创业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结论^[23]。潘春阳等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创业与其创业回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研究发现,创业与创业回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无论对于货币回报还是非货币回报都是如此;创业者的收入比非创业者的收入高30%~40%;创业者的工作时间更长,其幸福感也比非创业者要高^[24]。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Ben et al.分析了多个国家创业者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幸福感差异,结果表明物质层面的差异,如较高的薪酬、较少的工作时间以及潜在的人格差异等,都无法解释所观察到的幸福感之间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Ben et al.发现,个体经营者幸福感更高,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享有更大决策自主权^[25]。Andersson采用1991年和2000年中2000多个样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数据,对创业者及其雇用员工之间的幸福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创业者和雇用员工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创业者的幸福感相比雇用员工更高^[26]。Blancherflower和Blancherflower et al.通过比较分析11个OECD国家和一些

欧洲国家的数据发现,创业者比就业者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其幸福感更高^[27-28]。

然而,一些研究者却发现,创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振奋人心。Blanchflower 研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70 多个国家,发现创业者的比例在逐渐减少,很多创业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处于疲劳状态,会由于过度担忧工作而失眠,甚至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依旧认为自己创业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及人生,具有相当高的幸福感^[29]。Andersson 通过研究瑞典的微观数据后认为,创业者比就业人员遭遇了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但却发现创业者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比就业人员要高。此外,Ramón-Llorens et al. 基于自我管理的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研究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其幸福感和工作生活平衡两方面之间的差异,得出创业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争议性的结论,他们还发现了阻碍和促进这种关系的影响因素^[30]。

居民幸福感,是一个主观的综合评价指标,涉及到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创业活动涉及到政府以及微观主体,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居民创业项目成功与否的影响日益凸显。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文献的结论并未得到一致认可,并且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济面临着复杂的外部 and 内部环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已有文献的局限在于,一方面没有很好地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另一方面未能从微观视角分析创业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论的莫衷一是也是此前研究的一大局限。因此,为进一步明确创业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解析创业对居民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在传统 OLS 回归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 Ordered Probit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创业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计量模型与样本数据

(一) 研究假设

创业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独特性的经济活动,

具有较大风险,需要投入大量的物资和人力资本。Rahman et al. 认为,创业作为一个自我组织的过程,企业家精神与幸福感密切相关^[31]。创业可以带给创业者货币回报以及非货币回报。就非货币回报而言,大多数学者将其归为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创业者比非创业者具有更强的幸福感以及生活满意度。Andersson 使用 1991 年和 2000 年的瑞典生活水平调查数据,考虑了 6 项幸福指标,发现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工作幸福感,并且创业与其生活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26]。Peter et al. 通过使用 1984 ~ 2012 年德国社会经济评估数据,利用固定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自谋职业者具有更高的工作和生活幸福感;但研究也发现,自谋职业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微弱和暂时的,但是对于工作幸福感而言,具有显著的和相对持久的影响^[32]。Hundley 分析证实,创业者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满意,因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灵活性、技能利用率以及更大的工作保障^[33]。Haga 将熊彼特框架运用于人口萎缩和人口老龄化的农村社区问题,探讨创新型创业精神和企业发展能否在工作与幸福感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34]。同时,Haga 还通过将熊彼特方法运用于创业和创新,构建了一种假设的模式,发现创业与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幸福感会随着创业参与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是否创业及创业参与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Layard 认为收入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的社会中更为显著^[35]。官皓基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家庭调查数据,引入了绝对和相对收入指标,并运用了序数 Probit 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收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绝对收入对居民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对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收入越高,居民幸福感越强^[36]。任海燕等运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引入了绝对和相对收入变量,并运用有序概率估计法,分析研究收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37]。任海燕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相对收入,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都有很大的影响,考虑相对收入因素后,绝对收入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讨论,可以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是否盈利以及创业盈利水平与其幸福感也可能具有一定关系。Blanchflower et al. 提出了“如果那些经营自己的企业得到超常回报,他们应该比那些以员工身份工作的人快乐”的假设;他们通过使用英国和美国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正规就业形式相比,个体经营者报告的效用水平显著高于整体幸福感^[38]。Berglann et al. 通过分析挪威雇主与雇员的数据,发现创业具有正的货币回报,与收入较低的创业者相比,收入较高的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回报率^[39]。由此,本文提出相关假设2。

假设2:创业是否盈利以及创业盈利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

是否参与创业经营也是创业过程中影响消费者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Hanglberger et al. 在控制工作变化的预期和适应性的条件下,综合使用横截面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个体经营者的工作幸福感高于普通员工^[40]。Loewe 通过研究658个智利工人的全国样本,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个体经营对工作幸福感与生活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工作幸福感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个体经营者具有更高的幸福感^[41]。Harbi et al.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幸福感的自我就业效应,发现男性个体经营者的幸福感明显高于一般就业者,而女性个体经营者的幸福感与工薪阶层女性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42]。因此,结合本文的研究,提出假设3。

假设3:是否参与创业经营,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二) 模型设定及改进

在上述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实证分

析创业(venture)对居民幸福感(happiness)的影响,构建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happiness_i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venture_i + \alpha_2 \times Cv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中:venture表示与创业活动相关的代理变量,如是否创业、是否参与创业经营、创业是否盈利、创业的参与水平以及创业的盈利水平等方面。happiness表示居民对自身幸福感的主观评价。i表示居民样本个体, α_0 表示常数项, α_1 和 α_2 分别表示创业活动相关代理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系数, ε_i 表示随机误差项。进一步地,Cv_i表示相应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例如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教育水平以及婚姻状况等变量;此外,还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资产的拥有量等。考虑到住房对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43],本文将居民是否拥有住房也纳入到实证模型中,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幸福感(happiness)并非是连续性变量,而是有序离散型变量(在本文中为1~5的分类离散变量),因而若采用传统的OLS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在稳健性和精确度方面难以有所保证。基于此,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对OLS回归估计结果进行改进。为简化,设 $happiness^* = X'\beta + u$,其中,happiness*为不可观察变量,自变量向量 $X \in (venture, Cv)$ 且随机误差项 $u \in (u_1, u_2, \dots, u_n)$,n表示因变量的分类排序数目。同时,假定居民幸福感(happiness)的选择规则符合下述规则,即

$$Happiness_i = \begin{cases} 1, & \text{if } happiness_i^* < u_1 \\ 2, & \text{if } u_1 < happiness_i^* < u_2 \\ 3, & \text{if } u_2 < happiness_i^* < u_3 \\ \vdots & \\ N, & \text{if } happiness_i^* > u_n \end{cases} \quad (2)$$

式中: $u_1 < u_2 < u_3 \dots < u_n$ 为待估计参数,亦即切点。假设u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0,1)$,那么

$$P(happiness_i = 0 | X) = P(happiness_i^* \leq u_1 | X) = P(X'\beta + \varepsilon \leq u_1 | X) =$$

$$P(\varepsilon \leq u_1 - X'\beta) = \varphi(u_1 - X'\beta) \quad (3)$$

同理,可得

$$P(\text{happiness}_i = 1 | X) = \varphi(u_2 - X'\beta) - \varphi(u_1 - X'\beta)$$

$$P(\text{happiness}_i = 2 | X) = \varphi(u_3 - X'\beta) - \varphi(u_2 - X'\beta)$$

...

$$P(\text{happiness}_i = n | X) = 1 - \varphi(u_{n-1} - X'\beta) \quad (4)$$

式(3)和(4)中: β 表示自变量向量对应的系数向量, ε 表示随机误差项。不难看出,采用 Ordered Probit 回归方法改进估计结果之后,居民幸福感(happiness)的概率分布函数较之于 OLS 回归,变量数据特征的针对性更强,可为实证估计得到更为稳健和精确的结果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利用 Ordered Probit 回归,通过求解似然函数,得到 MLE 估计量,也为进一步提高估计精度提供了保障。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3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以下简称 CHFS)数据^[44]。样本共分布于除新疆、西藏、宁夏、福建、海南和内蒙古之外的 25 个省份^②。为避免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回答问卷不一致所带来的系统性误差,本文主要采用每个家庭户主的样本数据,同时剔除了户主年龄小于 16 岁的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共计得到 28 109 个样本。问卷中包含了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受访者主观态度、生产经营项目以及房产与土地等重要信息,为本文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居民的幸福感的变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受访者主观态度的变量,本文比较倾向于认可 Xiao 的观点,即应同时考虑主观和客观指标^[15],然而受到研究数据的局限,主要考虑采用受访者的主观回答以衡量其幸福感。在问卷中,本文主要通过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的幸福程度(1 = 非常不幸福、2 = 不幸福、3 = 一般、4 = 幸福、5 = 非常幸福)来衡

量居民的幸福感的。从问卷回答情况来看,有 42.11% 的居民感到幸福;有 14.59% 的居民感到非常幸福;有 34.85% 的居民觉得无所谓幸福与不幸福;同时,有 9.81% 的居民觉得目前生活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从是否创业来看,共有 3 495 个样本有从事工商业生产项目,占到样本总量的 12.43%;进一步地,从创业盈利情况来看,有 3 269 个样本盈利,占到参与创业样本总量的 93.53%;从是否参与创业经营情况来看,选择了创业并参与日常经营活动的比例达到 92.62%。此外,本文还给出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及家庭规模等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表 1)。

(四) 创业组织形式及行业分布情况分析

根据问卷统计分析结果(表 2),创业项目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个体/个体工商户等五大类。按照是否创业进行划分,总体样本中创业的样本为 3 495,其中 2 761 个项目的组织形式是个体/个体工商户,所占比重高达 79.00%,其他创业项目的组织形式(除无正规组织形式外)所占比例较小,都在 5.00% 以下。分析其原因,创业者之所以大多选择个体/个体工商户,主要原因是投资少且收益较快,而开设公司或企业的形式要求投入成本较高,条件也较高。因此,个体/个体工商户的创业组织形式占据主导地位。

对创业项目行业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表 3),可以看出在创业样本中,批发和零售业样本为 1 501 个,所占比重达到 43.00%,是创业项目中最受欢迎的行业。究其原因:第一,行业门槛较低,进入该行业创业的要求不高;第二,创业所需成本较少,投入资金低,而且成本回收较快;第三,该行业所需技术

① 截至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已经开展了 3 次,即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第 2017 年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其中,2011 年数据已向社会公开,2013 年数据可临时申请使用,2015 年仅供内部使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的样本量包含了 2011 年的样本。因此,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已有数据提供的有用信息,本文采用 2013 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② 为简化,省、直辖市、市和自治区在文中统称“省份”。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代码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幸福感	<i>happiness</i>	28 109	3.614 8	0.867 1	1.000 0	5.000 0
创业与否	<i>venture</i>	28 109	0.124 3	0.330 0	0.000 0	1.000 0
创业是否盈利	<i>winven</i>	28 109	0.133 0	0.339 6	0.000 0	1.000 0
是否参与创业经营	<i>ven_pa</i>	28 109	0.131 1	0.337 5	0.000 0	1.000 0
创业盈利水平	<i>ven_pad</i>	28 109	0.822 0	2.191 9	0.000 0	7.000 0
创业参与水平	<i>ven_pfit</i>	28 109	1.220 3	9.052 6	0.000 0	200.000 0
性别(男性)	<i>male</i>	28 109	0.756 9	0.428 9	0.000 0	1.000 0
年龄	<i>age</i>	28 109	51.416 6	14.419 3	16.000 0	113.000 0
年龄 ² /10 000	<i>age2_10 000</i>	28 109	0.285 2	0.154 1	0.025 6	1.276 9
家庭规模	<i>hhsz</i>	28 109	3.479 7	1.628 0	1.000 0	19.000 0
教育水平(高中至本科)	<i>edu_mid</i>	28 109	0.278 4	0.448 2	0.000 0	1.000 0
教育水平(本科及以上)	<i>edu_high</i>	28 109	0.086 7	0.281 4	0.000 0	1.000 0
婚姻情况	<i>marital_status</i>	28 109	0.854 0	0.353 2	0.000 0	1.000 0

注:表中数据经作者整理自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2 创业项目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	数目	所占百分比/%
股份有限公司	74	2.12
有限责任公司	149	4.26
合伙企业	128	3.67
独资企业	62	1.77
个体/个体工商户	2 761	79.00
没有正规组织形式	321	9.18
总计	3 495	100.00

水平较低。除批发和零售业外,住宿和餐饮业所占比重较高,达到 10.91%。究其原因,可能与该行业对原始资金的规模要求较之批发和零售业要高有关。

除了以上 3 类行业之外,所有创业样本涉及的行业还包括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以及房地产等共 14 类行业,在创业项目中所占比重都较低,均在 10.00% 以下。其中,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教育业所占比重都不足 1.00%。这些行业所占比重较低的原因也比较明显,主要因为投入成本较高、市场准入要求较高以及行业所需的技术性较强,因此创业者很少选择这些行业。

表3 创业项目的行业分布情况

所属行业	数目	所占百分比/%
采矿业	22	0.63
制造业	270	7.73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0	0.86
建筑业	200	5.7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313	8.9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85	2.43
批发和零售业	1 501	43.00
住宿和餐饮业	381	10.92
金融业	21	0.60
房地产业	19	0.5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2	4.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13	0.3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3	0.3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74	7.85
教育业	21	0.60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56	1.6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6	2.47
其他	44	1.26
合计	3 491	100.00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数据,分析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并使用相关分析方法进行了验证(表4)。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居民幸福感与创业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均较为显著。居民幸福感和是否创业的相关性,显著性水平较高,达到1%,相关性系数为0.0541;居民幸福感和是否参与创业经营及创业参与水平,均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563和0.0535;同时,居民幸福感和创业是否盈利及创业盈利水平,也都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651和0.0462。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文所提出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3一致。此外,分析创业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难发现:是否创业和创业是否盈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904;是否创业和是否参与创业经营相关系数为0.8878;是否参与创业经营与创业是否盈利相关性也非常高,为0.9224;创业盈利水平和是否参与创业经营的相关性最强,高达0.9653。同时,创业参与水平与是否创业、创业是否盈利、是否参与创业经营以及创业盈利水平等均显著相关,但相关性系数相对较低。

(二) 创业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数

据,分析创业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进一步提升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和精确性水平,本文综合采用了OLS回归和Ordered Probit回归的估计方法(表5、表6)。由于是否创业(*venture*)、创业是否盈利(*winven*)、是否参与创业经营(*ven_pa*)、创业盈利水平(*ven_pad*)和创业参与水平(*ven_pfit*)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分别予以重点关注。

表5报告了采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创业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结果,模型(1)至模型(5)的系数均显著。在保持模型设定不变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Ordered Probit回归改进了估计结果(表6)。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均较高。综合比较表5和表6回归结果,创业相关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控制变量系数符号均一致,且显著性水平较高。上述分析与比较,在一定程度上也确保了本文所构建模型的稳健性。

根据改进后的估计结果,创业可以明显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幸福感,模型(6)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这与假设1相符合。与亏损的创业项目相比较,持平或盈利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幸福感,这与一般的经济学直觉相一致。此外,创业项目盈利水平越高,对应的居民幸福感也越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会随之提高(模型(10))。这与本文所提出的假设2相一致。有创业活动并且积极参与该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居民,其幸福感水平较高;参与水平越高,幸福感的提升程度也随之提高(模型(8)和模型(9))。这与本文所提出假设3所表述的内容基本一致。邹宝玲等研究发现,创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借助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

表4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幸福感	是否创业	创业是否盈利	是否参与创业经营	创业盈利水平
是否创业	0.0541***				
创业是否盈利	0.0651***	0.8904***			
是否参与创业经营	0.0563***	0.8878***	0.9224***		
创业盈利水平	0.0535***	0.8615***	0.8902***	0.9653***	
创业参与水平	0.0462**	0.3113***	0.2972***	0.2962***	0.2755***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显著性水平。

段和平台,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竞争力^[45]。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提倡创业在重启经济增长引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自身的幸福感水平。

本文在构建创业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时,综合应用了 OLS 和 Ordered Probit 回归的方法,提高模型求解的精确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模型的控制

变量估计结果也与现实情况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相一致。具体来看,进一步分析其他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难发现:第一,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多数家庭中男性承担了较大的生活和经济负担;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中有 75.69% 的家庭户主为男性。第二,家庭规模较大,幸福感水平较低,这可能与居民所需承担家庭人口规模负担有关。第三,教育水平越高,居民幸福感水平也相对越高。第四,是否结婚,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高低。最后,居民的年龄与幸福

表 5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常数项	4.168 3 *** (0.057 4)	4.155 7 *** (0.057 4)	4.163 1 *** (0.057 5)	4.167 7 *** (0.057 4)	4.197 7 *** (0.057 3)
<i>venture</i>	0.150 2 *** (0.015 6)				
<i>winven</i>		0.174 5 *** (0.015 3)			
<i>ven_pa</i>			0.153 4 *** (0.015 4)		
<i>ven_pad</i>				0.022 4 *** (0.002 4)	
<i>ven_pfit</i>					0.004 1 *** (0.000 6)
<i>male</i>	-0.030 7 ** (0.013 7)	-0.031 1 ** (0.012 4)	-0.030 7 ** (0.013 7)	-0.030 7 ** (0.013 9)	0.030 7 ** (0.013 7)
<i>age</i>	-0.035 8 *** (0.002 3)	-0.035 5 *** (0.002 3)	-0.035 7 *** (0.002 3)	-0.035 8 *** (0.002 3)	-0.036 2 *** (0.002 3)
<i>age2_10 000</i>	3.609 7 *** (0.212 0)	3.596 2 *** (0.211 8)	3.605 3 *** (0.211 9)	3.607 4 *** (0.212 0)	3.616 9 *** (0.212 1)
<i>hhsiz</i>	-0.009 4 *** (0.003 4)	-0.009 8 *** (0.003 4)	-0.009 4 *** (0.003 4)	-0.009 3 *** (0.003 4)	-0.007 7 ** (0.003 4)
<i>edu_mid</i>	0.119 9 *** (0.011 2)	0.119 4 *** (0.011 2)	0.120 3 *** (0.011 2)	0.120 5 *** (0.011 2)	0.118 5 *** (0.011 2)
<i>edu_high</i>	0.150 0 *** (0.019 5)	0.152 9 *** (0.019 4)	0.152 3 *** (0.019 5)	0.152 4 *** (0.019 5)	0.140 3 *** (0.019 4)
<i>marital_status</i>	0.290 4 *** (0.016 2)	0.288 9 *** (0.016 2)	0.289 1 *** (0.016 2)	0.289 1 *** (0.016 2)	0.291 5 *** (0.016 3)
样本	28 109	28 109	28 109	28 109	28 109
F 值	95.860 0	100.800 0	96.860 0	95.660 0	91.010 0
调整后 R ²	0.026 3	0.027 6	0.026 6	0.026 5	0.025 0

注:①表中数据经作者整理自模型回归结果;②***, ** 和 * 分别代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③括号中数字表示对应系数的标准误差。

感呈现非线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永久收入理论假说。

四、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劳动力供求矛盾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矛盾逐步加剧。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作为“双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业除了能缓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后运行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的幸福

感。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传统 OLS 回归方法的基础上,综合应用 Ordered Probit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创业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可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居民幸福感与参与创业项目日常经营管理正相关,并随着居民参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持平或盈利的创业项目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盈利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提升水平正相关。此外,居民的幸福感还与教育水平、婚姻情况以及年龄等因素有关。

适逢国家提出“双创”的契机,我们应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在为经济发展以及结构优化调整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人的幸福感水平。

表 6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回归估计结果(模型估计改进后)

变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i>venture</i>	0.188 8 ***				
	(0.019 8)				
<i>winven</i>		0.218 7 ***			
		(0.019 3)			
<i>ven_pa</i>			0.192 5 ***		
			(0.019 4)		
<i>ven_pad</i>				0.028 1 ***	
				(0.003 0)	
<i>ven_pfit</i>					0.005 4 ***
					(0.000 7)
<i>male</i>	-0.039 2 **	-0.039 7 **	-0.039 2 **	-0.039 1 **	-0.039 1 **
	(0.015 6)	(0.015 6)	(0.015 6)	(0.015 6)	(0.015 6)
<i>age</i>	-0.044 9 ***	-0.044 5 ***	-0.044 7 ***	-0.044 8 ***	-0.045 4 ***
	(0.002 8)	(0.002 9)	(0.002 9)	(0.002 8)	(0.002 8)
<i>age2_10 000</i>	4.530 4 ***	4.516 8 ***	4.525 8 ***	4.527 6 ***	4.536 4 ***
	(0.266 4)	(0.266 5)	(0.266 5)	(0.266 5)	(0.266 4)
<i>hhsiz</i>	-0.011 7 ***	-0.012 2 ***	-0.011 8 ***	-0.011 6 ***	-0.009 6 **
	(0.004 2)	(0.004 2)	(0.004 2)	(0.004 2)	(0.004 2)
<i>edu_mid</i>	0.146 8 ***	0.146 3 ***	0.147 3 ***	0.147 6 ***	0.144 8 ***
	(0.150 0)	(0.150 0)	(0.150 0)	(0.150 0)	(0.150 0)
<i>edu_high</i>	0.182 2 ***	0.185 9 ***	0.185 2 ***	0.185 2 ***	0.170 0 ***
	(0.024 3)	(0.024 4)	(0.024 4)	(0.024 4)	(0.024 4)
<i>marital_status</i>	0.355 1 ***	0.353 4 ***	0.353 5 ***	0.353 5 ***	0.356 1 ***
	(0.020 3)	(0.020 3)	(0.020 3)	(0.020 3)	(0.020 3)
样本	28 109	28 109	28 109	28 109	28 109
LR Chi^2 统计量	743.38	781.14	750.86	741.28	708.42
Peseudo R^2	0.010 5	0.011 0	0.010 6	0.010 5	0.010 0

注:①表中数据经作者整理自模型回归结果;②***, ** 和 * 分别代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③括号中数字表示对应系数的标准误差;④因 Ordered Probit 回归中无常数项,故此处不予报告。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战略性思考。第一,抓住“双创”的机遇,合理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确保成功创业。研究中发现,相对于亏损的创业项目,收支持平或盈利的创业项目会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对于创业,当前政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措施,同时也为大量企业提供了创业支持平台,为确保创业成功,应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各种制度性资源。第二,提升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培训,从而提高创业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参与度。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参与水平越高,居民的幸福感也越高。然而,参与创业经营管理活动,需要以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经营管理经验作为支撑。因此,合理有效地提升人力资本,教育以及相关的创业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受中国人民大学谷克鉴教授及美国罗德岛大学肖经建教授指导及启发良多,在此表示由衷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 王海成,郭敏. 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政策的合理性[J]. 经济学动态, 2015(5):50-59.

[2] 穆怀中,范洪敏. 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就业的门槛效应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6(10):4-14.

[3] 谷克鉴,陈福中. 净出口的非线性增长贡献[J]. 经济研究, 2016(11): 13-27.

[4] 高强,潘春阳,吴柏钧. 个人创业回报问题的实证研究[J]. 企业经济, 2016(1): 101-106.

[5] Carree M A, Verheul I. What makes entrepreneurs happy? 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among founder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2): 371-387.

[6] Andrews F M, Withey S B.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6.

[7] Olshavsky R W, Miller J A. Consumer expectations,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perceived product quality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2, 9(1): 19-21.

[8] Anderson R E. Consumer dissatisfaction: the effect of disconfirmed expectancy on perceived product perform-

ance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3, 10(1):38-44.

[9] Day R L. Beyond social indicator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individual level [M]. Chicago: 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78.

[10] Lee D J. Developing a subjective measure of consumer well-being [J].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2002, 22(2):158-169.

[11] Pancer E, Handelman J. The evolution of consumer well-being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12, 4(1): 177-189.

[12] Sirgy M J.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on consumer well-being [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2008,27(2), 207-212.

[13] Sirgy J M, Lee D J. Macro measures of consumer well-being (CWB):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a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2006, 26(1): 27-44.

[14] 谢风华,刘国栋. 消费者幸福感研究述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6(3): 61-64.

[15] Xiao J J. Consumer economic wellbeing [M]. New York: Springer Press, 2015.

[16] 李时椿,刘冠. 关于创业与创新的内涵、比较与集成融合研究[J]. 经济管理, 2007(16): 76-80.

[17] 赵向阳,李海, Rauch A. 创业活动的国家差异:文化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J]. 管理世界, 2012(8): 78-90.

[18] 陈刚. 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管理世界, 2015(5): 89-99.

[19] Kirzner I M.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0] Audretsch D B, Thurik A R.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managed to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0, 10(1): 17-34.

[21] 张龙耀,杨军,张海宇. 金融发展、家庭创业与城乡居民收入——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7): 47-57.

[22] 尹志超,宋全雨,吴雨,等.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 管理世界, 2015(1): 87-98.

[23] 魏江,权予衡. “创二代”创业动机、环境与创业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14, 11(9):

- 1349-1357.
- [24] 潘春阳,王紫妍. 创业的得与失——中国居民创业的货币与非货币回报[J]. 世界经济文汇, 2016(4): 102-120.
- [25] Ben M, Frey B S. Being independent raises happiness at work [J].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4, 11(2): 95-134.
- [26] Andersson P. Happiness and health: well-being among the self-employed [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8, 37(1): 213-236.
- [27] Blanchflower D G. Self-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J]. Labour Economics, 2000, 7(5): 471-505.
- [28] Blanchflower D G, Oswald A, Stutzer A,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4/5/6): 680-691.
- [29] Blanchflower D G. Self-employment: more may not be better [J].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4, 11(2): 15-74.
- [30] Ramón-Llorens M C, Olmedo-Cifuentes I A, Madrid-Guijarro A. Well-being and work-life bal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non-entrepreneurs [M]. New York: Springer, 2016.
- [31] Rahman S A, Amran A, Ahmad N H, et al.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base of the pyramid entrepreneurs through business success: the role of private organization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7(1): 195-216.
- [32] Peter V D Z, Hessels J, Rietveld C A. The pleasures and pains of self-employment: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work, and leisure [R]. Amsterdam: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s, 2015.
- [33] Hundley G. Why and when are the self-employed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work? [J].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0, 40(2): 293-316.
- [34] Haga K.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ging societie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a case study from Kamikatsu, Japan [J]. Journal of Innovation Economics, 2015, 18(3): 119-151.
- [35] Layard R.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J]. Journal of Bioeconomics, 2008, 10(1): 97-99.
- [36] 官皓.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0(5): 56-70.
- [37] 任海燕,傅红春. 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11(12): 15-21.
- [38] Blanchflower D, Oswald A J. Entrepreneurship, happiness and supernormal returns [R].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s, 1992.
- [39] Berglann H, Moen E R, Roed K, et al. Entrepreneurship: origins and returns [J]. Labour Economics, 2011, 18(2): 180-193.
- [40] Hanglberger D, Merz J. Does self-employment really raise Job satisfaction? adaptation and anticipation effects on self-employment and general job changes [J]. Journal for Labour Market Research, 2015, 48(4): 287-303.
- [41] Loewe N. Self-employment as a moderator between work and life satisfaction [J]. Academi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Administracion, 2015, 28(2): 213-226.
- [42] Harbi S E, Grolleau G. Does self-employment contribute to national happiness? [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12, 41(5): 670-676.
- [43] 何立华,杨崇琪. 城市居民住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 8(2): 43-51.
- [44] 甘犁,尹志超,贾男,等.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 金融研究, 2013(4): 1-14.
- [45] 邹宝玲,李华忠. 交易费用、创新驱动与互联网创业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6(3): 26-33.